

试论辛酉政变

王杰民

【内容提要】辛酉政变是慈禧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重大事件。慈禧通过辛酉政变一举夺得国家最高权力,并从此实际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辛酉政变同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最高权力集团中的宫廷政变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也是权力的再分配。据辛酉政变而断定慈禧早就是政治野心家不仅论据不足,而且也不符合人物性格和事物发展的逻辑。对辛酉政变,乃至慈禧的一生,都应作具体的历史分析。

通过1861年的辛酉政变,慈禧一举夺得国家最高权力,从此实际统治中国长达48年。辛酉政变是慈禧早期的重要政治活动,也是清末的重大政治事件,因此很有研究必要。

辛酉政变概况

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即清文宗)崩于热河行宫,遗命以六岁的皇长子载淳(即同治帝)继位,并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额勒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卜寺少卿焦佑瀛总共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①这就是清朝家法中的“顾命”制度。即便是“赞襄”,也只是赞助襄理,是辅政而不是摄政,但顾命大臣却把持朝政。慈安太后和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不甘大权旁落和扼喉之忧的处境,不满肃顺等人的跋扈专擅,与顾命大臣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发生矛盾。

八月初一日,文宗异母弟恭亲王奕訢至热河值殿奠叩谒梓宫,慈安、慈禧以叙家常为名召见,密商合力对付肃顺。

根据载垣等顾命大臣的议定,咸丰皇帝的梓宫于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回京,两太后和小皇帝先期回京准备迎接灵驾,灵驾由肃顺

等护送。慈禧认为这是发动政变的极好时机,可以在顾命大臣无准备的情况下夺取权力。九月二十九日,两太后回到北京,立即与恭亲王密商事变事宜。

九月二十日,两太后召见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贾桢、周祖培和军机大臣文祥,控诉顾命大臣,正试提出垂帘听政,恭亲王遂奉旨派亲兵突然抓捕了载垣和端华。同时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奉旨前往途中拿回肃顺,押解来京。

十月初一日,上谕授恭亲王为“议政王”,并掌管军机处,以后又受命为内务府大臣,并赏食双俸,以示优礼。户部左侍郎文祥、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十月初六日,上谕赐令载垣、端华自尽,斩决肃顺,其余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五人被解任。党援形迹最著者吏部尚书陈孚恩流放新疆,资财被查抄,踪迹最密者黄宗汉被革职,永不叙用;外间有烦言者侍郎刘昆、成琦、太卜寺少卿德克律太、候补京堂富绩也被革职。

十月二十六日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并且将皇太后的权力用垂帘章程固定下来。章程共十一条,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条是“皇太后召见臣工”的礼节;一条是“京外官员引见”的礼节;加上“除授大员,简放各项差使”,事先开

单,钦定铃印的规定,使得两宫太后实际上代行皇帝的全部权力。十一月初一日在养心殿举行垂帘听政大典,于是“顾命”体制变为“垂帘”体制,两宫太后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从咸丰皇帝去世到实现垂帘听政,共经过103天。以上就是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的大概情形。

辛酉政变的起因

辛酉政变的起因须远从文宗得位谈起。文宗受其教师杜受田的传授,得皇位有巧取之嫌,其实才干并不如恭亲王,当之有愧。这在《清史稿》及清人笔记中都有记载。可见从文宗继位时起,兄弟手足便各有心病,互相猜疑。恭王日常行事,往往狂妄自大,对文宗不够尊重,这又逐渐加深了兄弟之间的矛盾。

咸丰三年十月,恭王初入军机处,以爵位最尊而成为“领班军机大臣”,即所谓军机领袖。咸丰五年,以静皇贵妃的封号事为导火索,兄弟失和公开化。静皇贵妃是恭王生母,文宗也是她抚育成人的(文宗生母早年已逝去),但她一直未获尊封,直到她临死前,文宗在恭王的催请下才很勉强地“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②。等康慈逝去,文宗一面以恭王“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②的原因,“令出军机,入上书房”^③,以示惩罚;一面“减杀太后丧仪”,^③即不以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只上康慈太后的谥号,神主不入太庙,以示嫡庶有别。文宗这些举动不免有忘恩负义之嫌,恭王对此无可奈何而又余憾不释,是可以想见的。

从以上事实,我们不难理出这样的头绪来:由于文宗与恭王手足参商,至使恭王于咸丰五年退出军机处;由于恭王退出军机处,肃顺才有机会于咸丰六年始逐渐得宠于文宗。

至咸丰七年,恭王复被起用,受命为都统,地位不如从前。咸丰九年,授内大臣。其时,肃顺已是文宗的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大臣并执掌印钥,以后又接任了户部尚书。

十个亲王之中,礼、睿、豫、郑、肃五亲王,是开国“铁帽子王”,庄亲王为顺治时所封,怡亲王为雍正时所封,这七个亲王都由承袭而来;惠亲王和惇亲王是由郡王晋封,只有和硕恭亲王是宣宗朱笔亲封,特显尊荣,又是皇弟,无疑对肃顺的地位是个威胁。恭亲王受命与洋人议和,肃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趁机中伤,于是诬传恭亲王将借洋人势力谋反,因而咸丰帝对恭王猜忌愈深。清朝最看重“亲亲尊贤”这个规矩,恭王是亲中之亲,无疑应为顾命大臣之首,不料竟被摒弃于顾命大臣行列之外。不然,依其才具、身份和地位,足以裁抑肃顺,牵制慈禧,自然不会有后来慈禧和肃顺的明争暗斗。

肃顺在排挤恭王的同时,拼命与慈禧为敌。文宗崩逝,由于肃顺有意拖延,慈禧晚了一日才得封太后,这是肃顺有意要把两宫太后分出嫡庶来。清朝家法,太后可以垂询国事,此所谓“听政”。但是当两宫太后提出章奏预先呈览以及用御赐两印代替朱笔时,肃顺却提出章奏不先呈览,而且两宫太后不能更易谕旨内容。如果这样,事无巨细皆经顾命大臣先行定义,然后呈上一览而行,名为佐助,实则主持,听政就成有名无实。肃顺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于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扬抑,意在构衅。”^④

八月初六日,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⑤。肃顺等人以“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该御史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甚属非是……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⑥驳回。十一日,再议董元醇折,双方激烈争吵,“复探知是日见面大争……太后气得手颤。”^⑦肃顺等人“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等事宜,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且于召对时有伊等系赞襄联躬,不能听命于皇太后。伊等请皇太后看折,亦为多余之语。当面咆哮,目无君上。”^④

肃顺实权在握,要罢逐他不是易事。两宫太

后受礼仪所限,只能深居宫闱,赤手空拳,如同坐禁闭。只有靠恭王的合作,上下合力,才能制裁肃顺一伙。钦差大臣胜保的奏疏要旨是“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④,这段话可能出于恭王授意。“近支新王”显然是指恭亲王,可见恭王支持两宫太后是有条件的,即皇太后“亲理大政”,恭王“辅政”。可以设想,如果恭王也在“顾命”之列并握实权,他必定会跟肃顺一样,坚决反对垂帘听政。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辛酉政变并非偶然事件,它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它起因于文宗与恭亲王的兄弟失和,而这又导致肃顺得宠及恭亲王被摒弃于顾命大臣行列之外。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引起围绕“顾命”体制和“垂帘”体制之争,以御史董元醇条奏垂帘听政一事为导火索,终于酿成事变。事变标志着统治阶级最高层互相之间的公开倾轧和斗争的白热化。

政变双方的力量对比

肃顺集团是个既得利益集团,主要力量是地位显赫、越级升迁的官僚。他们动辄打击排斥其它僚臣,导致自己严重孤立。而他们自己长期脱离实际,脱离下面,在斗争关键时刻缺乏勇武,没有战斗力。顾命八大臣,实际上是载垣、端华、肃顺三个说了算。怡亲王载垣是康熙第十三子的五代孙,郑亲王端华是太祖努尔哈赤之弟的后裔,是肃顺之兄。载垣和端华以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自居,养尊处优;额附景寿胆小怕事,“身为国戚,缄默不言”^④;其余几位都依肃顺为灵魂。因此顾命八大臣的关键人物是肃顺。

大学士耆英对英谈判泄露机密一案,由于肃顺所请,耆英被赐死。肃顺敢于整顿科场风气,措施过于严厉,也得罪了不少人。咸丰八年,科场主考官柏葭舞弊,由于肃顺的坚持,柏葭、房官翰林浦安、兵部主事李鹤龄、举人罗鸿泽被斩决,受牵连者或革职,或流放,或降职,一时间“士人满狱”,有人认为对柏葭处分太重:“其咎只在失察。予以褫革已觉情罪相当。若军台效

力,则重矣。乃肃顺等用意在乎修怨以立威,必杀之而后快。”^⑤

及至咸丰九年,查办“官钱号贪污舞弊案”,脏款总数达数千万两,株连数百人,主犯一律入狱并抄查家产。肃顺此举,固然是求治整顿,但用心是排挤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和大学士翁心存。凡此种种,户部郎中李慈铭在日记中写到:“年来部曹动辄获罪,入狱削官,累累不绝,亦近代所未有也!”^⑥邓之诚评肃顺时说:“起科场之狱枉杀柏葭;又起户部铸钱局之狱以撼翁心存。士大夫切齿久矣!”^⑦肃顺为筹措军饷,奏减八旗俸饷,也引起旗人普遍不满。

载垣、端华、肃顺三个被推翻,薛福成谓之曰“三奸伏诛”。他写到:“肃顺以科场钞票两案无辜受害者尤多,都人士闻将杀肃顺。交口称快……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郑之。顷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⑧可见肃顺树敌之多,不得人心。

肃顺常自做主张,自行其事,做事骄狂有余,计谋不足,诸如对慈禧的能量缺乏清醒的估计,对恭王的动作缺乏应有的警惕。肃顺在两宫太后听政一事上让步,以及未阻止两宫太后与外界接触,均属失策。载垣、端华、肃顺三个,以差使繁重为借,噪求两宫太后改派,本意是希望获得慰勉,借以显示两宫太后对他们的信任,从而提高他们的声望。不想慈禧顺水推舟,真的准奏,“载垣著开筵仪卫、上虞备用处事务,端华著开步军统领缺,肃顺著开理藩院并响导处事务”^⑨。肃顺三个平白无故丢了禁军兵权和一些可以作耳目的差使,加速了自己的失败。

肃顺与拥有重兵的督抚关系都不坏,可是自己手上没有立即可以调遣得到的兵力,这是他致命的弱点,以后在事变中束手就擒,与此不无关系。王闿运曾写信给拥有重兵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希望依湘军为肃党的武力后盾来反对两宫太后,建议曾国藩“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不得临朝”^⑩。老奸巨猾的曾国藩小心地避开了这场前途未卜的斗争。

胜保对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深恶痛绝,对

方也借感咸丰之手削他的兵权。咸丰帝死后,胜保自作主张驻军密云,以其兵力对肃顺等人虎视眈眈。他明知朝廷已明谕,谓各路统兵大臣等无庸奏请叩谒梓宫,仍以“叩谒梓宫,俾得跪求圣训,并与赞襄政务王、大臣熟商南剿一切机要”^⑩为名,不待朝廷允准,便自行兼程北上热河,胜保此行对肃顺等人不无威慑之意。两宫太后回銮途中,护送的禁军大部分是肃顺集团的人,但这时胜保已将军队沿途驻防,肃顺实际处于胜保监视之下。

肃顺监禁于宗人府时,怒斥载垣和端华曰:“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⑪说明他们早有应急之谋划,只不过未来得及下手罢了。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多陈孚恩亲笔书函,中有暗昧不明之语。”^⑫可见肃党有不可告人之秘密。

对比之下,慈禧精明决断。大权不到手,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由于她的警告,顾命大臣额驸景寿保持了中立;坚持章奏呈览及用御赐两印代替朱笔,使她初步取得过问国事的一点权利;联络恭王内外并举对付肃顺,避开了她自身无权无勇的弱点。否则,她是不敢轻试的。

慈安太后性格宽厚随和,也颇受肃顺等人表面上的敬重,但为保皇权,她和慈禧太后意志是相同的。虽然名份上两宫并尊,但她毕竟先入宫,且为皇后,又早一日得封太后,所以实际地位高于慈禧太后。如无慈安太后的明确表示,恭王等人很可能对垂帘之议持观望态度,自然不会有事变可言,所以慈安也是政变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醇郡王奕譞是咸丰帝异母弟。他不为咸丰帝重用,自然对有权势的肃顺有怨言。同时他是慈禧的妹夫,顺理成章作了慈禧的亲信,后来在事变中带兵捉拿肃顺,立了一功。

恭王手下的亲信工于心计,办事也极有效率,军机章京领班曹毓英颇有见识,熟知政令,收集情报和对外斡旋是他的特长;机密文稿的草拟和策应联络由军机章京领班朱学勤进行;总管内务府大臣宝_均和军机大臣文祥足智多谋;大学士桂良经验丰富;户部郎中李慈铭为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收集了不少有用资料;

还有刑部尚书绵森、兵部尚书沈兆霖、刑部主事方鼎锐、内阁侍读许庚身、工部员外郎朱智、大理寺少卿朱梦元等也为推动事变出了力。

还有一个人,虽未直接参与事变,但仍是不可忽视的威慑力量,他就是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七日,顾命大臣致函僧格林沁,谓:“各路统兵大臣,业经奉有谕旨,无庸奏请来京,惟王爷受恩至重,非各路统帅可比,似可具折叩谒梓宫,并请皇上节哀。”^⑬此中显然有拢络之意。僧格林沁不买他们的帐,接函后不但不奏请叩谒梓宫,反而在报捷折中向皇太后请安,顾命大臣很为恼火,再致僧格林沁称:“惟折内有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等语。查内外臣工折报,均系奏闻皇上,不宜书写‘皇太后’字样,此后王爷奏折,自应一律。应请惟用‘皇上圣鉴’字样为荷。”^⑭不料僧格林沁我行我素,回函驳斥:“皇太后阅折一层,已明示中外矣!而折内又不宜入,似与前传稍有未符。况皇上冲龄,未能理政,天下臣民尽皆深知,若必拘泥‘制,恐诚不能取信于天下臣民。是以沁有此书写耳。嗣后奏报,仍不敢不如此缮写。”^⑮

恭王是这次事变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不满足现状,希望重新分配权力,自然竭尽全力推动政变。恭王拢络兵部侍郎胜保参与政变活动,造垂帘之舆论,争取清议的同情,争取汉大臣贾桢和周祖培的支持,以及争取蒙古王公大臣的支持,这些活动比肃顺高了一招。恭王由于注重事变准备活动的隐蔽,处处麻痹肃顺,保证了突然发难,一举成功。事变地点选在北京,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此时肃顺的势力不在北京。

九月二十八日,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这时事变已布置妥当,胜保的奏折其实只是造舆论,顾命大臣根本来不及看。奏折要求“请将此折发交惠亲王、惇亲王、醇郡王等公同阅看,如有尚未尽善之处,应令大学士、九卿、科、道集议以闻。”^⑯九月三十日两宫太后回京,贾桢、周祖培、沈兆霖、赵光也递上一封奏折,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朝纲,而防流弊。这前后两份折子加上董元醇的折子,便成了两宫太后要求群臣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

的根据。由此可见上下配合之巧妙。

辛酉政变慈禧野心说质疑

综观事变全过程,对立双方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掌握国家最高权力,都进行了不择手段的活动。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两大集团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两宫太后和恭王的“神圣同盟”联系的社会面较宽,顾命大臣集团则较窄。在人才的数量方面前者占有绝对的优势,因而在斗争的策略方面,前者也要强得多。但是论及双方斗争的实质,应该说与历史上常见的宫廷政变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权力的再分配。

怎样评价双方在辛酉政变中的作为?自然要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它由不得因某些人事后的荣辱变化而变化。对于促成辛酉政变的复杂原因,许多人讳莫如深,不尽言其见,以致在理论上似乎使这个问题成了禁区。

历史研究中,慈禧一生似乎已有定论,和“野心家”划上了等号,慈禧研究也就因此带上了框框。在论及慈禧太后早期的政治活动时,有人认为她“有极强烈的权力欲望,善于权术”。“秘密勾结奕訢”,“攫取政权”。这些观点只有宣传上的意义,而在学术研究上应当作具体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

试问,难道肃顺没有权力欲和野心吗?面对英法等国的侵略,咸丰帝对外态度举棋不定,时硬时软,和战游移。咸丰十年(1860年),第2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侵略军攻天津,犯通州,向京师进逼,朝廷仍主和。朝廷的态度引起握有重兵的僧格林沁、胜保等人不满。胜保曾上奏,“极言夷之不足畏,且痛劾郑王误国罪”。潘祖荫甚至奏请咸丰帝斩载垣、端化、肃顺以谢国人。由于未认真备战,通州八里桥清军战败,京师暴露不可守。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为了使咸丰帝摆脱主战派的影响,从而更有效地挟持他,就极力怂恿他逃往热河,恭王等人对此极力反对,实则是反对肃顺挟天子以令诸侯。八月初八日,咸丰

帝终以“秋猕木兰”为名,仓惶避往热河。咸丰帝命恭王留守京师,惠亲王绵愉、惇亲王奕訢等辅之。派周祖培、西凌、文祥等满汉大噶留驻都城。这些武将和反对逃亡的翁心存、彭蕴章、潘祖荫等文臣在京城形成了一支重要的军政力量,控制了京师,给日后政变提供了理想的地点。

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北京条约》换约。恭王、胜保等王大臣一再奏请咸丰帝回京,为的是削弱肃顺等人对咸丰的影响。肃顺为保权计,总以“外国情形反复”为由,力阻回銮。事实上,咸丰朝最后四年肃顺已握有全部实权,尤其是咸丰十年以后,更是“国家大事,一以委之”。^⑩这时咸丰帝对肃顺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至于咸丰皇帝遗命中“赞襄一切政务”字样,则是肃顺等人自己加上去的,这在军机处上谕档中可见记载:“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联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⑪。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被肃顺等人借皇帝之口严旨切责“非臣下所得妄议。”^⑫这明明是不允许下臣进言,肃顺一伙专擅之实昭然若揭。

研究辛酉之变时,为什么会有“慈禧野心”说呢?笔者认为是由下述原因造成:

首先,是时间概念上的混乱。慈禧上台后变得越来越坏,据此断定她早就有野心,这种时间上由后往前的推理当然是欠妥的。

其次,是孤立地研究历史人物,过分强调个人的思想动机,看不到产生这种动机的原因和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变化。这样看问题就把政治生活的真实情况湮没了,就无法理解历史事件,更无法分析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离开两宫太后谈顾命大臣,离开顾命大臣谈两宫太后,根本就不是“辛酉之变”了。把人物之间的联系割断开来以自圆其说,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作法,虽然最省事,可是不足取。

历史上常以是否正统、是否名正言顺来议论是非,这不妥。在研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时候,不应宣传正统,而应着重展示特定历史条件和人与人的利害冲突。如果把慈禧推

翻顾命八大臣简单地解释为是政治野心驱使,那么下列史实: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朱棣起兵破京师,夺取帝位;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李建成;清康熙年间的夺嫡之争等等,又该如何评述?毫无疑问,如果慈禧没有一大批人全力支持,单凭玩弄权术,那是不可能上台的。两宫太后夺权和李世民夺权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但由于封建社会里“女人祸国”观点的影响,人们很快就接受了慈禧野心说。

大学士贾桢领衔的奏折说:“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①,这是对顾命大臣揽权行径的批判。顾命大臣擅自主持,抗旨不遵,实际已经把持了朝政,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肃顺跋扈不臣,施行封锁,这种叛逆行为是任何一个在上者都不能容忍的。垂帘听政制度是固然不合祖宗家法,但权柄不下移和太后听政却是祖制,清开国初年,文皇后不是听政了吗?在顾命大臣谋反大逆的时刻,两宫太后夺权是让无可让的最后办法。

咸丰临终将两方玉印赐给那拉氏和皇后,此举似乎不单纯表示留念。咸丰生前把它们作为皇权的象征,赐于皇后和那拉氏,目的在于防止皇权落入大臣之手。当时清代官员的书札和笔记中,都记载了这史实。在《热河密札》中记载:“两印均大行所赐,母后用‘御赏’印,上用‘同道堂’印。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顾命大臣致吏部兵部咨文称:“本王、大臣拟旨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鈐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②表明顾命大臣对太后听政的权力是承认的。文宗虽委任肃顺等人辅弼幼主,便对肃顺存有戒心,怕他危及载淳,觉得只有两宫太后能与肃顺匹敌。他在这种矛盾心理支配下,设计了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互相牵制,维持平衡的方案,目的是保住皇太子载淳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宫太后夺权并没有违背文宗的意图。慈禧上台,实际上是文宗利用太后剪除危害皇权势力的结果。若把辛酉政变仅仅说成是慈禧篡权,还不能揭示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

更没有揭示其间包含的家族、宗法等复杂因素。

慈禧之所以能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角色,与她的阶级地位不无关系,对此不应回避,不应忽视清朝和前朝政治体制的不同之处。汉初吕后临朝,虽然大开杀戒,但由于元老旧臣为相,吕后不能得逞。宋仁宗以冲人即位,章献刘皇后垂帘听政,由于李迪等大臣遇事裁抑,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因为前朝体制允许大臣握有与君权对等的相权,因而可以牵制皇后和太后。清朝的情况则不同。胜保奏疏所说“朝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专,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并非前朝可比。”^③就是对清朝君臣关系的极好说明。例如慈禧和恭王的身份地位就截然不同。固然当初若无恭王的支持,就没有两宫太后的政治生存。但另一方面,恭王的荣辱沉浮则依慈禧做为靠山。辛酉之变成功,恭王被任命为议政王,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与太后对等的权力。研究慈禧,不应对她早期的政治活动贬斥太过,更不应相信带有封建意识的“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④的说法。

慈禧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独裁得,是顽固势力的总代表。但说她早有野心,一开始就坏,尚立论不足,也不符合人物和事物发展的逻辑,难免有贬斥太过之嫌。对慈禧在辛酉之变中的所做所为,我们不值得推崇,但她并非劣迹昭著,也不必予以谴责。历史人物不是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几个字就能概括得了的。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历史环境中,性格和作为是多变化的。从纵的方面讲,对历史人物要按时间的先后分阶段评价。不同的阶段,环境不同,矛盾不同,他们的作为和影响也不同;从横的方面讲,对矛盾各方和各种联系都考察,把历史事件当作一个统一过程来研究,揭示人物所受时代的影响,行为产生的原因。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看事物的全部总和,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力求准确完整。尽管做起来不容易,但应该努力。

【注释】(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室《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1978年):

①(朱谕著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一切政务),咸

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②《清史稿·文宗本纪》。

③王湘绮，《棋祥故事》。

④《谕内阁蒋载垣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即行治罪》，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⑤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六日。

⑥《谕内阁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另简亲王辅弼均不可行》，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二日。

⑦《热河密札》，见《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3页。

⑧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⑨薛福成，《庸庵笔记》。

⑩《赵缙堂日记补》，咸丰十年三月初五日。

⑪《旧闻拾零》，《棋祥故事》序。

⑫《谕内阁著开载垣等管理处所缺》，咸丰十一年九月初二日。

⑬胜保，《奏呈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二日。

年八月初二日。

⑭《谕内阁陈孚恩与肃顺交往密切著即拿交刑部查抄资财》，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⑮赞襄政务王大臣，《为可奏请叩谒梓宫事致僧格林沁函》，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七日。

⑯赞襄政务王大臣，《致僧格林沁函》，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⑰僧格林沁，《为嗣后奏报仍书皇太后对鉴事复赞襄政务王大臣函》，咸丰十一年九月。

⑱《清史稿》，第三十八册，梅11699页。

⑲贾桢等，《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政纲纪折》，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⑳赞襄政务王大臣，《为发下谕旨以“御赏”、“同道堂”方章为符信等事致吏部兵部咨文》，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㉑《汉书·霍光金日 传赞》。

〔作者简介〕王杰民，男，1940年出生，1965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现为哈尔滨量具刃具厂计算机中心高级工程师。（责任编辑 李景文）

（上接第91页）党人执政为民，必须时刻牢记手中的权力具有两重性，使用得当可以为人民服务，使用不当则会对人民造成危害。毛泽东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关键在于不忘共产党人的宗旨，鞠躬尽瘁，勤政为民。

四是加强党风建设，不断完善各项改革措施，始终把反腐败斗争寓于改革开放实践之中。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必须花大力气纠正党内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严肃查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干部不是纯而又纯的客体，他们作为社会的人身兼多重社会角色，除了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之外，也应肯定他们会有个人利益的要求，这种个人利益的追求应该得到肯定。然而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更不允许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不允许把商品经济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而应该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利益，否则，还要共产党员干什么呢！今天重提毛泽东廉政实践，学习毛泽东廉政理论，有益于重振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大大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征程中，要塑造共产党人美好的人格，必须世代代高扬毛泽东思想旗帜。

【注释】

(1)(6)(9)(20)《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1329页、588页、949页、1328—1329页。

(2)(3)(4)(5)(7)(8)(10)(11)(12)(13)(14)(15)(16)(17)(18)《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66页、356页、375页、481页、364页、430页、362页、360页、342页、343页、314页、475页、479页、548页、425页。

(19)该信现存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转摘自《韶山导游》第197页。

〔作者简介〕董芳，在中共江苏南通市委党校工作。

（责任编辑 李景文）